

《当代中国社会》第二讲

新中国·新社会·新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建设

2018年3月15日



↑图为学生讲演

↓图为学生针对课堂议题的讨论



众说纷纭的毛泽东时代：

1950年代上海社会的成功改造曾是用来书写中国革命胜利带来的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不可或缺的佐证。新当权者们得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周密的或革命性的变化——而非循序渐进的变化——这能力本身，便是对革命胜利的考验。即使在冷战思维占据统治地位的年代里，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也不曾妨碍学者们对大上海社会神速变化的事实确信无疑，都承认1950年代的中国有一个‘上海奇迹’的出现。

右部文字为引述，
为海外学者所持，
仅为打开话题，不
代表个人观点。

但在最新潮的学术作品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往往被称为是“剧场社会”。尽管在最初国家似乎通过“福利”+“强力”成功地贯彻了自己的意志，获得了人民的认同，但由于“福利”的有限性和“强力”对日常生活的伤害，“松气退坡”的小农的汪洋大海——随着“理想”感召力的下降和“翻身”话语/记忆的淡去——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淹没起初似乎十分炽热的来自国家力量的岩浆。

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毛时代的社会建设呢？



当主讲的何成云同学提出这一问题后，同学们纷纷根据自己几年来的专业所学知识和自身经历（耳闻目睹）对此进行了表达。

吕晓莹同学表示，自己就是毛时代社会建设成果的切身享受者——正是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队伍和农村医疗建设，使得她在母亲临

产、来不及就医的凶险时刻，在曾经当过赤脚医生、受过助产训练的一位女士的帮助下顺利降生。

其中，一位旁听的韩国留学生表示，以前从未想过毛时代是否有社会建设的问题，在以往接触的相关论述中，一般都认为毛时代人们处于精神狂热、物质匮乏的生活状态之中；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十分好奇。

实例：

毛时代的失业救济、娼妓改造、医疗卫生制度等

通过对同学们观点的梳理，何成云同学对“社会建设”的定义作出了再解释，即



“所谓的社会建设，其实就是权力主体通过各种**社会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有效**治理**各种**社会问题**，提升并保障**民众生活水平**，从而建构**社会认同**的过程。”因此，毛泽东时代虽无“社会建设”之名，但有“社会建设”之实。

随后，何成云同学又以建国初期北京失业工人救济、上海娼妓改造等为实例，回顾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建设；尔后，又以农村合作医疗在毛时代、新时期的起伏更迭为例，向同学们发问：“如何理解毛泽东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于磊同学援引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对某些学者“国家吞噬了社会”的论断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市民社会的传统，即令

没有国家的干预，也并不存在“社会”——如果高度离散的“社会”也能称作“社会”的话——相反，毛时代的种种运动正是中共对于整合社会、建造社会的努力，只不过中共对于“社会”的理想模式与西方理论迥异而已。

车宗凯同学援引七千人大会和改革开放初期的“边缘革命”，指出，毛泽东时期的央地关系并非许多海外学者所言是高度集中的，相对苏联模式而言，中国地方具有几乎独立成系统的工业结构，即“条条”之外还有“块块”；毛时代一直在努力进行着某种分权性的实验。

最后，何成云同学总结道，“如果没有1950-1970年代中国国家在基础医疗保障、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入，很难想象中国在随后出现的经济增长，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政权必须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来评价。”